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Origins of
Imperial Power in Medieval China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 与皇帝权力起源

徐冲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 与皇帝权力起源

徐冲 著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Origins of
Imperial Power in Medieval China**

Xu Chong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 / 徐冲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9(2018.6重印)

ISBN 978-7-5325-8531-1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中国历史—中古史—研究
②政治制度—研究—中国—中古 IV. ①K240.7
②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6345 号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

徐 冲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2 插页 5 字数 320,000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101—4,200

ISBN 978-7-5325-8531-1

K·2355 定价: 8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罗 新

与徐冲君相识已经十多年了，所幸友谊与日俱增而不是日见其淡。回想在《三国志》阅读课上的初识，我纳闷为什么他后来从没向我提起那时的我是多么草包而且猖狂。和很多教师不同的是，我和他多年交往的主要内容不是学业授受，而是东拉西扯聊闲天。徐冲，以及他的许多同学，很早就表现出了出众的学习和思考能力，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这一代学人只能起烘托的作用，这也决定了我在他们面前从不敢以师长自居。好在我没有。看到这么多年轻学人成就日高，如庾信诗所谓“上林催猎响，河桥争渡喧”，对中国学术的未来再不必作杞人之忧，虽在极不舒畅的时代环境中，毕竟因依稀的远景而可略感宽慰。

评价三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的复兴（也许充其量只是回到正轨），要等我们所祈求的未来出现后才可以进行，未来越美好，这三十年的意义就越重要。与五四之后的那三十年不同，我们这个时代未能产出一批宗师级的大家，尽管成就卓越者也可以列出一个不短的名单。我记得1981年一个下雪的冬夜，在北大老二教听一位大名鼎鼎的七七级作家演讲，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出现伟大的作家。那时我少年及青春期的梦想只是受到暂时的打击，多年后我才理解他的话：心灵和人格都笼罩阴霾的社会甚至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情感，谈什么文学、谈什么学术呢。然而五、六年来观察年轻学人的思想自觉与学术实践，我越来越对未来抱持信心，或许这并不全是一厢情愿、自我陶醉。我已经读到很多令我自叹不如的论著，我知道更多的正在涌现出来，而徐冲这一本，无疑会列入这个越来越长的书单。

读者一定会留意到徐冲在本书前言里对自己的要求：“不受制于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对自我立场与现实处境的不断反思中探求‘历史’的更多可能。”这里的“意识形态”大概并不单单指某种政治教条，而是包含了一切学术之外的主流的、热闹的、时髦的思潮。这正是“先立乎其大者”。历史学家理应在寂寞中有所为、有所守、苦心孤诣，才能无中生有、掀翻常识，从而有所贡献于所处时代的知识与思想的再生产。标的虽高，却绝非高不可攀。徐冲此书虽非字字珠玑，却至少都别出心裁，自有会心。书中各章，我有幸见证了作者的开题、推敲和修订，现在捧读定稿，深深为他感到欣幸。

在新一代中古史学者中，徐冲是少数几个较早形成独特风格的，这当然是难得的成就，但我作为老友也乐见他能更上层楼、别开生面。六年前在奈良古平城京遗址聊天，我们谈到各自对未来学术的期待，我说我这一代以及比我年长者所能做的十分有限，史学的重大突破还是看你们。岁月匆匆，这些年间我虽有跬步之进，徐冲君已矫矫在前矣。今昔之叹，哪抵得上对将来的期盼呢？

诚惶诚恐敢言之。

前言

“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开头写下的这句具有永恒魅力的经典，说明对时间流逝的感知与纪念，或许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但同时又是人类行为中最为奥妙难解的谜团之一。我们歌颂远古的“黄金时代”，我们追赶“时代的车轮”，我们看到“历史终结”，我们谈论“大国崛起”。与现代社会中的其他“专家”相比，历史学家的身份也因此常常显得有些尴尬。“学历史有什么用？”这个几乎每一位历史系的教师和学生都会遭遇的“终极提问”，在我看来就是“历史感”支配下的人类行为的一个滑稽注脚。人们对于“历史”的关注，可能和人类“历史”本身一样古老。现代“历史学”的成立，既没有也不可能剥夺非历史学家的“历史需求”。毋宁说“历史学”本身也不过是作为一种人类基本行为的“历史需求”的现代变奏之一。

本书是在现代历史学——更为具体地说，是1980年代以降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科规范之下，对于中国中古时代政治社会的“历史需求”问题，所提供的一份观察报告。如同书名所显示的那样，我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古时代每一个王朝的皇帝权力起源过程，与其纪传体王朝史的“历史书写”之间，究竟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史的视野之内，汉唐之间的王朝更替频繁，且参与要素多元，为我们观察皇帝权力的起源过程提供了足够数量且类型丰富的样本。而叙述这一起源过程的纪传体王朝史，恰恰又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最为主流的历史书写类型。将这两方面的内容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入讨论，相信会为更为深刻地理解“历史需求”这一复杂而有趣的人类行为提供一份独特的经验，并与我们今天

的具体处境发生更多层次的关联。

敏锐的读者可能从目录和参考文献中即可察觉,本书相关的主要史料是汉唐间的“正史”。这一类型的史料在现代历史学科中有着某种近乎矛盾的双重形象。一方面,作为传统史学的代表,正史在民国以降的主流历史学中颇有“污名化”的趋势,以至于有罗志田指出的“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之吊诡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在一种“史学史式”的视野下,魏晋南北朝时期被描述为一个个性解放、私人撰史盛行的时代,几部有名的正史成为了探讨其作者个人“史学思想”的重要素材。“正史”的上述形像无疑与中国现代历史学科的构建本身相辅相成,本书则希望能在突破如是学科限制、更为充分地发掘正史价值方面做一些探索性质的努力。

正史当然不是北朝墓志、敦煌卷子这样的一手史料,不是西北汉简、满文老档这样的原始档案,但是所有这些现代历史学的评价都不能抹杀其在中国古代尤其是中古时期的“历史书写”中的核心地位。研究古代中国而无视或者不能“正视”正史,无疑是十分偏颇的;而我們也需要从更多新的角度来对正史文本进行重新解读。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将西方思想史研究的焦距从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转向了这些文本所在的具体“政治”语境;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对中国古代正史的理解从“史学”转向“政治”,从“作者”扩展至“时代”。“二十四史”只是中国古代数量庞大的正史书写中因为种种因素留存至今的一小部分。若运用历史学的各种手段,特别是通过搜寻已经佚失的同时代其他正史作品的蛛丝马迹,努力重建其被书写当时的具体语境,当可发掘出彼时的政治社会通过相关的历史书写所欲呈现的样态、结构与功能。在这样的视野中,一些史学史式的二元对立概念如“官修/私撰”、“国史/前朝史”、“直书/曲笔”等等,都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本书刻意回避了“纪传体断代史”这一“史学史”意味甚浓的指称,而代之以“纪传体王朝史”,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为达到上述目标而全面展开对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再探讨,当然是这本小书所不能胜任的。量力而行,我只在中古时期的“纪传体王朝史”中选取了四种较为典型的结构性存在作为探讨对象,即本书四个单元所显示的“起元”、“开国群雄传”、“外戚传/皇后传”和“隐逸列传”。“起元”

指国史中从何时开始采用本王朝的纪年方式纪年。可以看到,“禅让后起元”的书写方式贯穿于魏晋王朝,甚至一直延续到了刘宋前期;但从大明六年徐爱撰修刘宋国史开始,南北朝的国史书写全面转向了“禅让前起元”。“开国群雄传”指纪传体王朝史中以前代王朝的末世群雄为书写对象的一组列传。同样以徐爱撰修刘宋国史为节点,“开国群雄传”在魏晋和南北朝的纪传体王朝史中呈现出存在与缺失的截然区分。“皇后传”看似是纪传体王朝史中与“本纪”一样自明的结构,但在两汉时代的历史书写中却一直是以“外戚传”名篇的,直到魏晋时期才被有意识地改称。“隐逸列传”的成立也发生于汉魏之际,其背后是魏晋王朝皇帝权力的起源与东汉后期清流士人的谱系关系。在我看来,纪传体王朝史中的这四种结构都可以视为中国古代王朝的特定“意识形态装置”,即通过在纪传体王朝史中设定如是结构,达到特定的意识形态目的。这同时也意味着,纪传体王朝史中意识形态装置的设置,与政治社会中皇帝权力结构的构成,存在某种程度的对应和互动关系。如本书的具体考察所显示的,意识形态装置的面貌转换,往往与皇帝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动相辅相成。

我在书中也谨慎避免了使用“皇权”一词,而一律代之以“皇帝权力”。后者并非前者的全称那么简单,而是希望以一种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史。在相当多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皇权”被理解为“皇帝个人的权力”,并在“皇权与相权”之类的经典命题中得到主体性的应用。而使用“皇帝权力”替代“皇权”,是意欲将其还原至政治社会中权力秩序的层面,也就是用以指称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中所实现的最高支配权及其相关的权力秩序。作为这一最高支配权担当者的皇帝个人或者“皇权”,只是整体权力秩序的表象之一;真正值得深入考察的,是权力秩序本身的起源、结构与崩坏。“组织,既是一种容器,又是容器中的内容;既是结构,又是过程;既是对人类行为的制约力量,同时又是人类行为的结果。”^①埃哈尔·费埃德伯格(Erhard Friedberg)对于现代社会中“组织”的这一描述,

① (法)埃哈尔·费埃德伯格(Erhard Friedberg)著,张月等译《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3页。

也适用于本书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皇帝权力”的理解。

藉由“历史书写”问题,在本书中尤其得到重视的,是身处皇帝权力结构之中的人们自身,对于这一权力秩序的表达、认同、反抗与再造。我们可以将这些均视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为“历史需求”背后的力量,“意识形态”与人类文明如影随形,从来未随“历史”终结。就像本书单元一所讨论的,魏晋国史在前代王朝纪年之下书写本王朝的“创业之主”,北齐时代的李德林却以为国史若在北魏年号之下书写高欢事迹,“便是编魏年,纪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传,岂复皇朝帝纪者也”。这与何者秉笔直书、何者隐晦曲笔的问题完全无关,却是不同时代与皇帝权力相关的意识形态的生动呈现。意识形态不是对权力的粉饰与伪装,它本身就是权力,在与支配群体的共谋中维持着权力秩序的平衡状态;某个时刻却也会成为颠覆性的力量,引发冲突与变革。旧的王朝崩溃,新的皇帝权力起源,但历史并没有陷入循环。因为破坏前者的意识形态力量,一定也是后者成立过程的参与者,直至新的权力秩序格局的形成。本书所讨论的中古时代纪传体王朝史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才得以成立的。

总之,本书是我近年来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学习与摸索过程的一次小结。2003年夏天曾在本科毕业纪念册上写下“咸与维新”之语与同学共勉。轻狂趋新的少年情怀自然不值一晒,此刻却能深深感到,不受制于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对自我立场与现实处境的不断反思中探求“历史”的更多可能,本是历史学家的基本诉求,但实践起来委实不易。期待学界师友与读者诸君的批评指正,以新旧我。

本书的大半基础来自于2008年6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部分内容曾经发表,此次经增删修改,统一体例后汇为一编,虽然分量轻如鸿毛,也算是研究生涯的一个小小纪念。个人资质鲁钝,在史学领域迟迟不能得其门而入,直到现在写文章也常常有“业余选手”的感觉。幸而无论是在北大求学阶段,还是来复旦工作以后,身边总有可以请益学问、切磋互动的师长和学友。北大历史系的阎步克先生、罗新先生和李新峰先生,在我的成长

道路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如此。尤其是业师阎先生,以自身的研究业绩,示范了一位历史学学者所能达到的思维高度,引我前行。陈苏镇、胡宝国、王锬、侯旭东、叶炜、顾江龙、余欣、魏斌、王珊、孙英刚、朱溢、方诚峰、孙正军、陈侃理、仇鹿鸣、陈文龙、胡鸿、凌文超等师友的批评指正,让本书各章最初的幼稚面目褪去不少。由伊藤敏雄、荣新江、罗新诸先生促成的 2005—2007 年在日本的留学,极大推动了我个人研究思路的形成,与渡边信一郎、中村圭爾、辻正博、佐藤達郎、佐川英治、岡部毅史、松下憲一、阿部幸信、安部聡一郎、小尾孝夫、戸川貴行、永田拓治、福永善隆等日本师友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台湾大学历史系的甘怀真先生,是另一位对我的思考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现在还常常“翻墙”去看他主页上的最新文章。蔡宗宪、赵立新、郑雅如、李昭毅、涂宗呈、王安泰、游逸飞等诸位学友之谊也让我心怀感念。而 2008 年来上海工作以后,复旦历史系宽松的研究环境和活跃的交流气氛提供了本书得以完成的基础。当然学院生活冷暖自知,今天我还能在这里安心地看看古书,依赖的是“家里人”一直以来的信任和包容。在此谨向所有参与我成长的人们深致谢意。

目 录

序	罗 新 1
前言	1
单元一：“起元”	1
小引	3
第一章 魏晋国史书写的“禅让后起元”	5
一、“从泰始为断”：西晋国史书写的“起元”问题	5
二、“禅让”与魏晋王朝的皇帝权力起源	11
第二章 南北朝国史书写的“起元”前移	19
一、“起元义熙，为王业之始”：刘宋国史的“禅让前起元”	19
二、“取平四胡之岁为齐元”：北齐国史的“禅让前起元”	29
三、结语	41
第三章 西魏北周无年号纪年考	44
一、问题的提出	44
二、西魏北周无年号纪年的时代面貌	47
三、无年号纪年与魏、周禅代	58
单元二：“开国群雄传”	67
小引	69

第一章 “开国群雄传”小考	72
一、三国至南朝前期“开国群雄传”的存在	72
二、“驱除”观念的变化	87
三、南北朝后期“开国群雄传”的缺失	91
四、结语	98
第二章 《旧唐书》“隋末群雄传”形成过程臆说	100
一、五代修《旧唐书》立“隋末群雄传”	102
二、韦述《唐书》立“隋末群雄传”	107
三、令狐德棻《国史》不立“隋末群雄传”	111
四、关于“隋末群雄传”进入唐代国史的一个推测	116
单元三：“外戚传”与“皇后传”	123
小引	125
第一章 汉代的“外戚传”与外戚权力	127
一、汉代的“外戚传”	127
二、汉代外戚权力的“正当”与“不正当”	132
第二章 魏晋南朝“皇后传”的成立	142
一、魏文帝《甲午诏书》与“汉魏革命”	142
二、魏晋南朝“皇后传”的成立	146
三、结语	151
第三章 新出北魏《李晖仪墓志》与魏收《魏书》：北朝外戚 书写的一个断面	154
一、前言	154
二、《李晖仪墓志》序文与魏收《魏书》的外戚认识	157
三、魏收家族与陇西李氏的姻戚关系	163
四、结语	167

单元四：“隐逸列传”	169
小引	171
第一章 汉代的隐逸书写与隐逸理解	173
第二章 “处士功曹”小论	183
一、关于《隶释》所载《繁阳令杨君碑》与《杨君碑阴》	186
二、繁阳令杨君碑碑阴题名者的身份与“处士功曹”	191
三、不应辟命场合“故吏”身份的扩张	198
四、地方社会的“新秩序”	205
第三章 “二十四贤”与曹魏王朝的隐逸书写	211
一、《四八目》所载“二十四贤”的史料价值	212
二、“二十四贤”的构成与汉魏革命	216
三、曹丕彰表“隐逸”的建安背景：两例个案	224
四、曹魏王朝的隐逸书写	230
第四章 两晋南朝“隐逸列传”的成立	236
一、《三国志·魏书》的隐逸书写	236
二、两晋南朝“隐逸列传”的成立	240
三、“新秩序”下的王权与隐逸	247
附录一：两晋南朝“白衣领职”补论	256
一、东晋前期的“白衣领职”	257
二、魏晋时期的“白衣领某职”	260
三、东晋末南朝“白衣领职”与“免官”的并列	263
四、余论	267
附录二：汉唐间的君臣关系与“臣某”形式	270
一、问题的提出	270
二、汉代情形的再确认	273
三、魏晋南朝“第二次君臣关系”下的“臣某”形式	277

四、魏晋南北朝“第一次君臣关系”下的“臣某”形式	284
五、结语：对汉唐间“二重君臣关系”的反思	290
附录三：川勝義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评介	295
一、前言	295
二、内容简介	297
三、京都学派？——学术史中的川勝史学	301
参考文献	310
索引	332

单元一：“起 元”

小 引

《晋书》卷四〇《贾充传附贾谧传》记录了一段西晋朝廷关于“国史”修撰的争论：

（贾谧）丧未终，起为秘书监，掌国史。先是，朝廷议立《晋书》限断，中书监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尽入晋史，于时依违未有所决。惠帝立，更使议之。谧上议，请从泰始为断。于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张华、领军将军王衍、侍中乐广、黄门侍郎嵇绍、国子博士谢衡皆从谧议。骑都尉济北侯荀勖、侍中荀藩、黄门侍郎华混以为宜用正始开元。博士荀熙、刁协谓宜嘉平起年。谧重执奏戎、华之议，事遂施行。^①

贾谧为西晋开国元老贾充之孙，^②曾“掌国史”之职。上引史料中所谓的“《晋书》”、“晋史”，当然也都是指西晋王朝之“国史”。可以看到，从武帝朝到惠帝朝，在王朝修撰国史的过程中，围绕“立《晋书》限断”的问题，西晋朝廷中出现了三种不同意见，即“从泰始为断”、“用正始开元”和“宜嘉平起年”。其中，泰始为武帝司马炎受魏禅建立晋王朝后行用的第一个年号（元年为265年）。正始和嘉平则均为曹魏后期年号。如所周知，司马懿于正始元年（240）与曹爽一起受魏明帝遗诏

① 《晋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1173—1174页。

② 谧本姓韩，为贾充外孙。充死后无嗣，其妇郭槐请以谧为充子黎民子，奉充后。此事在朝廷引起一定争论，详见《晋书·贾充传》，第1171页。